



#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私藏归公”研究

——兼述《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书文化内涵

□王雨潇\*

**摘要** “西学东渐”以来,随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日益完善,私人藏书“化私为公”成为大趋势。文章在分析“西学东渐”背景下“私藏归公”理念与行动的基础上,解读王安功所著《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内容梗概与著述特点,以“书厄”与访书、旧书交易、私藏的保护与归公三点为中心,梳理近代以来文献的递藏状况;由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三个方面,解读藏书文化的转型;基于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对我国藏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探索,提出藏书史研究需要形成自身研究范式,并对藏书史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

**关键词** 典籍归公 文献递藏 藏书史 藏书文化

**分类号** G256.4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2.015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渐成风气。传统封建时代的经济与文化受到西方理念冲击,逐步开始动摇。随着“平等”“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近代的藏书事业出现了多个维度的新变化,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不同于以往藏书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史实考证”形式的成果,河南师范大学王安功所著《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新华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书归何处》),以文献递藏线索为基础,运用大视野、多维度、共时态的组织方式,力图书写近代以来的藏书史发展与藏书文化演变。

本文对文献递藏与藏书文化转型进行线索整合与内容解读,分析该书对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的具体运用,以期对藏书史研究角度与范式提供参考。

## 1 “私藏归公”的理念与行动

从1840年林则徐翻译《四洲志》,到1912年京师图书馆开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起源阶

段<sup>[1]</sup>。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并翻译、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西方科学著作<sup>[2]</sup>。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即“在形态上从古代藏书向公共图书馆的转变,在特性上从私有、封闭、专享向公共、公开、共享的转变”<sup>[3]</sup>。

近代以来,图书馆广收博采的原则和灵活多样的征书方式,使得民间私人藏书不断流向图书馆。面对动荡的社会局势与逐步增加的经济压力,藏书家们认识到自身“守护私藏”的能力存在局限性,“化私藏为公有”渐成其处理个人藏书的方式<sup>[4]</sup>。但私人藏书转归公藏有时并非出于藏书家的自觉自愿,这一过程凝结着许多图书馆人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说,藏书“化私秘为公开”这一发展趋向,正是在图书馆学家的指引下与少数藏书家的模范示范下艰难实现的。

## 2 《书归何处》的内容梗概及著述特点

《书归何处》从文献递藏、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角度,宏观构建了我国近代藏书史研究背景,将藏书

\* 王雨潇,ORCID:0000-0002-6409-7169,邮箱:915528977@qq.com。



文化这一具体研究领域置于近代社会发展史大环境中看待,进而探究近代以降典籍与社会、典籍与文化、典籍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 2.1 内容梗概

《书归何处》全书共33万余言,分为十一章。引言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藏书文化史研究现状。正文部分的第一章由中西学的融会与公藏理念的传播两方面,透视中国藏书文化传统与近代以来社会嬗变之关系。第二章梳理了近代以来“书厄频发”的文化创伤。第三章讨论了由旧到新的书业发展,通过个案展现文人淘书之趣。第四章从兴趣和责任角度分析了近代域外访书的因果,提出中外书籍互访的反思。第五章着眼于藏书文化转型,探讨了清末民初“新知识群体”的开先之举。第六章以“后四库时代”的耿文光(1830—1908)为个案,聚焦藏书史研究学术书写方式的改变。第七章由《藏书纪事诗》展现出清末民初藏书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分时段回顾了民国初期至当代私家藏书的保护、归公、整理与出版情况,介绍了近代图书馆运动、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体系,展现出私人藏书家“公藏”意识的觉醒。

余论部分总结了由耕读传家到书香文化价值观的转向,由此引出近代以来典籍归公对书香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附录部分的《近代以来典籍递藏统计简表》,对近代136位藏书家的姓名、籍贯、字号、藏书特点及钤印、藏书流向进行了详实考证与完整统计。

## 2.2 著述特点

《书归何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著述特点。

其一,具有明确的组织线索。该书以文献递藏为出发点,先后梳理了近代以来藏书外流、旧书交易、中外书籍互访、藏书家捐书建馆、私家藏书归公等文献递藏情况。每章主题之间具有学术逻辑性,从中可管窥我国藏书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状况。

其二,话题与个案相交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作者关注整体社会环境下的文献递藏与藏书文化转型,思考典籍在文化、社会和学术生活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列举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私家藏书归公案例,梳理私藏流向,分析其原因并总结其带来的启示。

其三,具有问题意识,聚焦藏书史发展中的“变化”。关注近代藏书文化,就必须关注藏书文化近代

以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思想<sup>[5](30)</sup>。该书每一章的设置分别聚焦于诸如“私藏归公”、藏书事业发展、藏书史学术书写转变等“文化转型”主题,从动态的历史演进中归纳不同时期藏书史的阶段性特点。

全书从文献递藏出发,以近代“文献递藏”“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三条线索为组织方式,以“话题+个案+启示”为叙述方式,以藏书史发展中的“变化”为切入点,生动展现近代藏书事业发展状况,分析其与文化、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并对藏书史研究范式进行反思。

## 3 近代文献递藏的揭示

文献是藏书活动的基本对象,对文献的搜集访求、典藏保护和传承传播,是历代藏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变迁、文化传播、观念转型的直观体现。该书借由近代文献递藏状况入手,分别围绕“书厄”与域外访书、古旧书交易、私藏保护与归公三个中心进行整理论述。

### 3.1 以“书厄”与域外访书为中心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藏书文化一直以稳定性和自足性为主流。经过西方外力压迫与殖民主义掠夺,加之农民战争的蒙昧特质,大量文献资源与藏书设施被毁,形成了近代藏书史乃至学术发展史上的文化创伤<sup>[5](56)</sup>。

《书归何处》在第二章《文化创伤:书厄频发的社会殷鉴》中,分别回顾了近代“甲骨东渡”与“敦煌西流”的国殇,及以铁琴铜剑楼、皕宋楼为代表的私家藏书流散。作者在回顾“书厄”史实的同时,思考文献流散的发生原因与对文化造成的冲击力。第四章《兴趣与责任:域外访书的因果》,详细考证、梳理了杨守敬(1839—1915)于清光绪六年(1880)出使日本后的访书之路。其访书活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通道,引发了清末民初近五十年的东瀛访书活动<sup>[6]</sup>。此后,傅云龙、罗振玉、缪荃孙、王国维、董康等学者皆赴日本访书。此外,张元济、胡适、王重民亦为重现敦煌文献之面目前赴后继。

正如作者所言,近代“书厄”与域外访书一起构成了近代藏书史的重要论题,二者本质上互为因果,具有两位一体的特性<sup>[5](113)</sup>。“书厄”作为近代史中的文化创伤,造成了中国典籍文献的散佚与损失,但随之而来的域外访书活动却又有利于藏书文化的交



流、传播与转变,推动其良性发展。该书由“书厄”与域外访书这一角度入手,总结文献递藏与流通状况,探究藏书史的别样维度。

### 3.2 以古旧书交易为中心

近代以来的“书厄”造成古旧书资源流入民间,满足了其交易、流通的前提条件。作者以古旧书业的兴衰与转型为线索,梳理了基于古旧书交易的文献递藏。在第三章《中西并存:旧书业的壶里春秋》中,首先以地域为划分标准,分别介绍了北方琉璃厂与南方新旧书业的兴起、发展与转型,随后梳理了近代书局的发展,分析了出版业对传统书业发展模式的冲击,体现社会转型这一大趋势对传统书业的直接影响。

书肆是藏书家觅求藏书的重要场所,书商是书籍与藏书家结缘与离散的媒介,其个人素质与经营方式等,均能反映出民众对藏书这一文化活动的喜好<sup>[7](266)</sup>。以文献递藏为中心来解读近代旧书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书商与藏书家之间、书肆与书肆之间的文献流通。书商与藏书家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交易实现了文献流通,使各类书籍汇入淘书者手中。书商与书商之间的文献流通则体现在我国古旧书业在不同区域的交流互动。如南北书肆交流的兴替发达体现着中国藏书文化中心的衰长;书肆经营的数量、规模、书刊品类等较大粒度的记录,则是不同时期社会群体阅读需求、社会风气的直观体现;古旧书市货源及行业发展的转变,也昭示着近代社会巨变的酝酿过程。

这一交流与融合过程不仅实现了文献流通,更是南北地区文化差异与经营方式的碰撞与融合。书籍的跨区域流转,虽然受政局、经济水平等条件限制,但其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 3.3 以私藏保护与归公为中心

近代公共藏书机构设立以来,随着“视图书为天下之公器”观念的树立,私藏转为公藏逐步为藏书家所认同。该书详细整理了近代以来136位藏书家所藏典籍的递藏与归公简表,直观、真实地展示私家藏书的流转过程与最终去向。由表格可见,除战乱中毁于兵燹,以及藏书家本人去世后私藏散出、流入旧书市场或远渡海外之外,大量的私藏经历各种流转,最终通过出售、捐赠或寄存等形式汇入各地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

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变化无常,大量的古

籍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私人藏书家在此环境中守护珍藏的能力微弱,借助国家、社会力量保全藏书成为必然趋势。1949年后,更多的私家秘藏公诸海内,汇入公藏,为传播文明与开启民智提供助力,不少曾经的私藏古籍被整理出版,化身千百。该书以袁同礼(1895—1965)、郑振铎(1898—1958)等文化界人士为个案,梳理其典籍抢救义举的同时,体现出当时社会发展大环境中典籍聚散离合之命运。又梳理了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潘世滋(1906—1992)、潘景郑(1907—2003)将自身所藏捐公的过程,并从私家藏书文化的角度,探寻典籍归公的成就与意义。

总体而言,历代“书厄”造成的文化创伤,警醒也激发了数代藏书家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藏书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典籍归公成为历史大势。私藏典籍从四面八方汇入公藏,直观体现出了“化私秘为公开”的中国近代藏书发展特征。

## 4 藏书文化转型的解读

晚清至近代,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至藏书事业之中,形成了清政府、洋务派、维新派与西方传教士四种力量互相交织的状态<sup>[1]</sup>。这一时期藏书文化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三个方面。

### 4.1 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与西方学者拥有共同的研究潮流,才能在世界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并且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sup>[8]</sup>。在建立自身学术体系迫切性的推动下,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思想逐步改变,为新图书馆运动与私藏捐公的浪潮作了铺垫。

20世纪20年代前后,新图书馆运动在全国展开,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时,图书馆界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图书馆知识的专门人才。其中不少人曾留学海外,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和服务精神;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藏书文化有较深刻的把握,立足本土图书馆事业发展,着力于教育体系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这些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对图书馆的基本原则、服务对象、职能等基础性方面予以揭示,构建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奠基性理论<sup>[9]</sup>。该书在第八章《保存国故:民初图书馆运动与藏书文化》部分,对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家的学科建设贡献、学术影响力与人生





经历分别进行了梳理,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家的群体特征。

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倡导、奏请、兴办和主持近代图书馆,培养中国图书馆学人才,才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与藏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资料、舆论基础、思想准备和政府支持。

#### 4.2 藏书理念的转变

藏书家的职业特点,是其在晚清新政后最先转化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最先接触西学而获得知识更新。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推动藏书家藏书理念转变的重要原因<sup>[10]</sup>。

该书在第五章与第八至十章由清末藏书家“捐书建馆”风气说起,提出晚清公共图书馆运动与私藏归公潮流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也是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实践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sup>[5](145)</sup>。随着“公藏”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不少人士开始了由私藏转向公用的新尝试。正如王献唐(1896—1960)所言:“诚以图书文化之构成,乃吾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全体努力之总和,亦当公布于全民族,不能使之集中于某一所在也<sup>[11]</sup>。”其具体可由两个方面加以体现。其一,在私藏基础上成立图书馆,向社会或公众开放。其二,将私藏以出售、捐赠或寄存的方式转归公藏<sup>[7](366—367)</sup>。公共图书馆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营造了图书公益流通的浓厚氛围,传统守藏观念式微,公共藏书理念逐渐成为时代潮流。

随着藏书理念的转变,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难以计数的私家藏书以百川汇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图书收藏机构。

#### 4.3 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

在趋新的文化制度下,新派知识人、老派读书人对书籍的认识皆发生着变化,新的藏书史写作范式层出不穷。该书第六章、第七章独立于整体的“私藏归公”主题,聚焦于藏书史研究的范式与学术书写方式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专题性。

作者通过分析“后四库时代”的“学术转向”与学术发展背景,以学术史的视角揭示了耿文光的藏书偏好及其藏书的共性特征。耿文光的学术观点已有古典集成性到现代性转化的特质;其“目录门径说”思想更是具有传统学者面对新的思潮冲击依然坚守传统的“代表性”,诠释了小标题“稽古为新”;其藏书

目录思想的核心是恪守《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传统,也对“西学东渐”有充分的条目安排,有一定的个案和先导意义。

该书的第七章引入“文化记忆”研究理念,分析清末以来藏书史书写方式的改变。文化记忆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维度决定了历史和社会的双向阐释路径,记忆研究因此也与民族认同、文化复兴及社会问题密不可分<sup>[12]</sup>。作者首先以叶昌炽藏书史撰述中的“宋代叙述”为起点,对《藏书纪事诗》的体例特色与“开创性价值”进行解读。复又以藏书为中心,对宋代文人学子群体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认为其创新了藏书史研究的学术书写形式,也体现出了晚清时期藏书史书写的创新性特征。

### 5 藏书史研究理论视角的探索

近代藏书史研究是区域性、断代式探析与宏观式通论性撰述的并行发展,由区域断代式向综合通论式逐步深入<sup>[5](1—4)</sup>。现阶段的藏书史书写划分标准不外乎体例、题材、方法、视野等,对近代藏书史研究的著述也主要区别于研究理论视角的不同。该书作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藏书史研究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分别以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进行书写。

#### 5.1 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

该书以“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为切入点之一。此种价值观视角的产生基于古人对典籍的文化想象来展开,即将原本的防蠹香料“抽象化”为一种专门的文化符号,以半虚构的方式将其构筑为一种“隐喻式”的文化象征<sup>[13]</sup>。由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回溯近代乃至古代的藏书活动,可探究不同时期人们对书籍本身与藏书、读书活动的定位,形成一个具有“价值评判倾向”的文化体系。

该书所论述的文献递藏、流通过程,不仅仅是对典籍的实体命运的梳理,更是构筑出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文化演变与社会发展,涉及到不同时代、地域、群体之间人文内涵的碰撞与融合。作者以文献递藏展开,关注其与藏书家生涯发展、藏书政策改变等相互交织的关系,从而逐步增加新的线索,构建起文献递藏与文化发展的线索关系网。

伴随着典籍的流传,大量的藏书、阅读行为出现,书香文化在“感情上或认知上”逐步成为“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活动和传统习俗,象征一种共享的、



潜在的价值观”<sup>[14]</sup>，隐喻良好的社会想象和人文追求。书香文化也由实体形态无限接近意识形态，从而进一步凸显了象征的历史维度。

## 5.2 文化转型视角

文化转型视角着眼于近代新旧文化与思潮冲突、融合再到创新的过程。作者认为，近代文化转型跨越了“总结性思潮的出现”“新理念的引入与新旧思潮冲击”及“新模式替代(包含)传统模式”三个阶段。

该书将文化转型视角运用于近代藏书领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引入与传播方面。由文化转型视角来剖析近代藏书史，以“变”这一标准评判各种社会力量与群体，将会出现多个并列的动态链条体系。正如前文论述，近代藏书文化的转型，主要有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学术研究的转变三部分。总体来看，伴随着西学的冲击，知识分子的认知转变，学术教育体制改革、近代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传统读书人的治学取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样才出现了典籍的“化私为公”、藏书理念的“由私密至开放”、学术研究的“稽古为新”，进而使近代藏书文化出现嬗变。

正如作者所言，“藏书一事与社会文化关联甚多。细细考论，宏旨现矣<sup>[5](9)</sup>。”社会文化的转型，在藏书史研究方面也有着具体的表现。从“私藏捐公”这一文化现象入手，进而对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播与图书馆学产生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中国近代以来藏书文化的转型，可对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做一次侧面的查证。

## 5.3 社会史视角

社会史这一理论视角，将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看作社会发展变迁的载体进行深入研究。即既要深挖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本身，又要与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阐明其发展变迁。

长期以来，藏书史研究汲汲于藏书家个人经历、藏书掌故变迁等历史事实，而对这些历史事实本身的社会文化可能性缺乏深入分析，导致其研究方法无法预流史学主脉，也更难以产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sup>[5](1)</sup>。作为社会发展状况的侧面体现，对藏书史的撰述不仅要注重单个掌故、每个藏书家的记叙情节，还要注重对文化结构、社会局势等的记述。

此外，当代藏书史研究者须转移研究方向，改变

研究方法，走进历史的深层和微观。藏书与社会文化互动模式，尤其是整体史、地域史、断代藏书文化研究，与通史、通论模式相互补充，呈现出藏书史研究的多样化特点。研究近代藏书史，需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如注意研究“图书馆”这一文化现象的社会关系<sup>[15]</sup>，而非其本身的物理形态。故而藏书史研究不应只聚焦于对文献本身的考证与相关历史事件的梳理，也应考虑到其背后的社会内涵，拓展藏书史研究的社会视野。

正是在多维度的理论视角之下，近代藏书史研究才能不落入“史料堆砌”的窠臼，而是将线性的历史演变脉络与面状的社会发展样态相结合；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持的同时，也应回归研究初衷，形成适合自身的成熟的学术范式，进一步突出藏书史研究的价值。

## 6 结语

典籍的化私为公也许不能尽为民所用，但这一举措为开启民智创造了条件。《书归何处》不再局限于藏书家及藏书事实本身，而是通过物理形态的文献来沟通其与社会、文化、思想的联系，使之为社会发展史及其内部的不同领域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第八章将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家划分为“现代图书馆学先驱者”“职业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攸关者”“图书馆事业活动家”四个类型与层面，此种分类方式存在概念模糊、各类交叉过甚的问题，可在参考程焕文“图书馆四代人”理论基础上进行调整细化。附录部分《近代以来典籍递藏统计简表》若能分别标明史料来源，将为研究者查证该藏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极大的便利。

## 参考文献

- 王平,王雨潇.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起源[J].图书馆论坛,2018,38(8):68-76,16.
-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
-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406.
- 彭斐章.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书于徐行可先生捐赠藏书五十周年之际[J].图书情报论坛,2010(2):3.
- 王安功.书归何处 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2.
- 宋庆森.杨守敬等学者东瀛访书记事[N].新华每日电讯,2014-1



- 17(4).
- 7 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
- 8 苏健.国家图书馆同人著述研究(1909—1949)[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
- 9 蒋亚琳.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5):135—137.
- 10 毛旭,凌冬梅.中国藏书的历史与传统[M].北京:朝华出版社,2020:154.
- 11 曹景英,马明琴.海源阁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74.
- 12 刘慧梅,姚源源.书写、场域与认同: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8(4):185—203.
- 13 潘娜娜,李飞跃.文化想象视域下西方中国观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5):86—92.
- 14 李天紫.文化隐喻——隐喻研究的新发展[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29(5):109—111.
- 15 谢灼华.序[M]//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8.
-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8日  
修回日期:2024年1月9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 The Research on the Return of Private Collection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Spreading to the East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ooks in *Where Books Go: Library Culture and Society Since Modern Times*

Wang Yuxiao

**Abstract:** Since the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to the Eas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library system, the trend of turning private collections into public ones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private collection returning to publi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spreading eastward”,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summa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Angong’s *Where Do Books Go: Collec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focusing on “book crisis” and book visits, old book transac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return of private collections, sorting out the collection status of literature since modern times; interpr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ok collection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mergence of new trends in libr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ok collection concepts, and the academic evolution of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research. It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in China, proposes tha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needs to form its own research paradigm,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Keywords:** Classics Returned to the Public; Literature Collection; History of Library Collections; Library Culture